

中國哲學史

任繼愈主編

第三冊

人民出版社

13
234
3:3

中國哲學史

任繼愈主編

第三冊

隋唐五代宋元明部分

1620/17

人民出版社

1956年8月北京

中国哲学史

第三册

任继愈主编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 印张12 · 字数 269,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1·130 定价 0.7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五篇 統一封建国家重建与地方割据 时期（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 （公元 589 年—公元 960 年）

第一章 隋唐五代时期经济状况、阶级矛盾与思想斗争	3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	3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斗争	8
第二章 傅奕反佛教斗争及吕才、卢藏用、李华的唯物 主义无神论思想	13
第一节 傅奕的反佛教斗争和无神论思想	13
第二节 吕才对当时社会流行的迷信思想的批判	16
第三节 卢藏用《析滞论》的无神论思想	21
第四节 李华对占卜迷信的批判	23
第三章 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	25
第一节 对传统思想怀疑与批判	25
第二节 对历史典籍中五行灾异神鬼迷信记载的驳斥	28
第四章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上）	33
第一节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的形成和它的兴衰过程	33
第二节 天台宗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	37
第三节 法相宗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	47
第五章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下）	58
第一节 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58
第二节 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宗教哲学	79

第六章 唐朝道教宗教哲学	95
第一节 道教在唐朝的地位和作用	95
第二节 司馬承祿主靜去欲的道教學說	96
第七章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軍事辯证法思想	100
第一节 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論思想	100
第二节 重視主观作用的辯证法思想	104
第三节 主动发现敌人意图和利用权术的軍事思想	108
第八章 柳宗元、刘禹錫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	112
第一节 柳宗元、刘禹錫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产生	112
第二节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論思想	113
第三节 柳宗元重“勢”的进步社会历史观	117
第四节 刘禹錫自然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120
第五节 刘禹錫“天人交相胜”說	124
第九章 韓愈和李翱的唯心主义哲学及其反佛教的斗争	129
第一节 韓愈的道統學說和他的反佛教的斗争	129
第二节 韓愈的性三品說	136
第三节 李翱性善情恶“复性”學說	138
第十章 《化书》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唯心主义自然观	143
第一节 譚峭《化书》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143
第二节 譚峭一切皆化的唯心主义自然观	148

第六篇 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加强和巩固

时期(宋元明)的哲学思想

(公元 960 年—公元 1646 年)

第一章 宋元明时期的政治、經濟状况与思想斗争	153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政治与經濟	153
第二节 階級斗争、民族矛盾复杂化、深刻化的条件下, 宋明 理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157

第二章 李觀和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	162
第一节 李觀的唯物主义思想	162
第二节 李觀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166
第三节 王安石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認識論	170
第四节 王安石的辯证法思想	174
第三章 周敦頤、邵雍、司馬光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178
第一节 周敦頤《太极图說》的客观唯心主义实质	179
第二节 周敦頤的“誠”和“主靜”学說	181
第三节 邵雍唯心主义象数学的宇宙发生論及退化論的 历史观	185
第四节 司馬光的天命思想和道德决定論	190
第四章 張載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97
第一节 “太虛”为万物之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198
第二节 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	202
第三节 辯证法思想	204
第四节 認識論的唯心主义傾向	208
第五节 唯心主义的人性論和神秘主义的倫理观	211
第五章 程顥、程頤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217
第一节 二程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范畴——理	218
第二节 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論	222
第三节 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的認識論	224
第四节 宣揚僧侶主义的人性論	226
第六章 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231
第一节 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和太极	232
第二节 格物致知的認識論和知先行后的知行学說	237
第三节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241
第四节 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倫理学說	245
第五节 唯心主义的天理史观	250
第六节 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252

第七章 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257
第一节 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	257
第二节 自存本心的方法論	261
第三节 朱陆的異同及相互爭吵的实际意义	265
第八章 陈亮、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	269
第一节 陈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270
第二节 陈亮的进步历史观及其反对朱熹复古主义的斗争	275
第三节 叶适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認識論	280
第四节 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对各派哲学思想的批判	285
第九章 黄震的哲学思想和邓牧的爱国主义思想	289
第一节 黄震的哲学思想	289
第二节 邓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性的社会思想	291
第十章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295
第一节 王守仁的生平及其政治活动	295
第二节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	297
第三节 “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格物說	303
第四节 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說	309
第十一章 罗欽順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313
第一节 “理一分殊”的唯物主义本体論	313
第二节 对王守仁等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318
第三节 先天道德观和人性論	321
第十二章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326
第一节 王廷相的生平及其社会活动	326
第二节 “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論	327
第三节 以行为主的唯物主义認識論	332
第四节 以形气为基础的人性論	337
第五节 历史观方面的进步思想	339

第十三章 王艮和泰州学派的唯心主义反动实质	342
第一节 王艮的唯心主义格物說	342
第二节 王艮“不假安排”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	347
第三节 泰州学派的发展	350
第十四章 李贽的进步的社会观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354
第一节 李贽反权威思想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355
第二节 封建的功利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論	360
第三节 对道在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365
第四节 反权威的相对主义真理观	369

第五篇

統一封建国家重建与地方割据 时期(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

(公元 589 年—公元 960 年)

第一章

隋唐五代时期经济状况、 阶级矛盾与思想斗争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社会 发展与科学发展

在南北朝的末期，北朝的封建国家有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方面超过了南朝。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在土地制度方面，北朝实行了均田制，农民获得少量的土地，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北方农业生产技术比南朝先进。即使在南朝比较强盛时期，已经“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亡也。”（《梁书·贺琛传》）

在发展生产方面，南朝的門閥士族地主阶级长期不接触生产，只过着腐化享乐的生活^①，纵情歌舞，飲酒賦詩，以致“兵挫于行間，吏空于官府”（《神灭論》）。而北朝的統治者从上到下比较关心生产，如北魏的官吏賈思勰的《齐民要术》即是对农业生产經驗的总结，对当时农业生产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① “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尔。假令有者，皆令僮僕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識世間余务乎？故治官則不了，营家則不办。皆优閑之过也”（《顏氏家訓·涉务》）。

在政治方面，北朝有意識限制門閥士族的势力。自从北周开始，“周氏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愷傳》）。門閥士族在北朝的势力已逐漸削弱。隋統一后，凭借北方地主階級的支持，进一步打击了江南的門閥士族的势力。隋文帝楊堅曾命“州县大索貌閱”^①，把門閥士族包庇下的佃客、部曲清理出来，归国家直接控制，使广大个体分散的劳动者直接承担納稅、劳役。向門閥士族夺取劳动力，是对門閥士族經濟力量的最严重的打击。隋朝統治者，继承了北周的制度，“隋承周制，官无清浊”^②（《隋书·陆彦师傳》）。隋朝仍沿用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具体办法是每丁授露田 80 亩，永业田 20 亩，妇人得露田 40 亩，奴婢同平民一样分得露田和永业田。只是規定貴族占有奴婢数目有限制^③，因而貴族占有土地也随着有了限制。耕牛一头，受田 60 亩，每戶限止四牛。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可以满足这一分配方案，在地狭人多的地区，即不够分配。即使如此，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仍起了积极作用。隋朝初年有人口二千九百万，二十六年后，煬帝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人口增到四千六百万以上。国家粮食儲备，按平常开支，可供政府几十年之用，征收的粮食、絹帛，仓库都装不下。这都是打击門閥士族，消灭分散割据势力，建立統一王朝后經濟繁荣的气象。农民在統一政府之下过的生活，比依附在門閥士族地主階級之下的負担，相对地有所減輕。隋朝統治者要使人民知道，“为浮客（門閥士族的佃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賦；为編氓（国家的农民），奉公上，蒙輕減之征”（《通典》卷七）。

隋朝統治者到了第二代，看到国家財富有丰厚的积累，人口有

① 核对人民的年齡、相貌，清理全国戶口。

② 出身于門閥士族的，当时叫做“清”；出身于寒門庶族的叫做“浊”。

③ 亲王可有奴婢 300 人，平民可有奴婢 60 人。

显著的增加，便无限制地使用民力、物力，开运河，营建洛阳宫殿，修筑长城，发动战争，这些方面都耗费了千百万的人力。开运河客观上对于连系南北交通，活跃经济有好处，但是兴工过急，通济渠的工程（由黄河到长江）用了一亿五千多万个工，平均在五个月内，每户出工 20 个，“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营造东都洛阳，每月役丁二百万，十个月中，“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卷一八〇）。

对外连年用兵，使全国青壮年都受到兵役的直接影响。广大人民在严重的军役、力役、赋役的压榨下，无法活命，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的高潮。在七、八年之间，终于推翻了残暴的隋炀帝和他的政权。

由于隋末统治者滥用民力，对外征伐，以及统治阶级对起义军的屠杀，突厥人乘机俘掠人口，以致“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杨玄感传》）。唐朝初年，全国户口还没有达到隋朝的三分之一。到公元 632 年（贞观六年），“自伊洛以东，及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旧唐书·魏徵传》）。

农民起义对地主阶级的教训是深刻的，唐太宗李世民亲眼看到一个强大的隋王朝是怎样灭亡的。他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卷一）。李世民还深切认识到农民力量可以决定统治者的命运，因而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一）。李世民这一统治集团和汉初的统治者

一样,也由于农民起义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光靠武力不能使他的统治牢固,他也经常用这个道理教育他的大臣:“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煬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安义,此乃朕之甲兵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农民起义的威力,迫使统治者对人民的利益作了一些让步。这就是历史上所谓“贞观之治”的由来。

唐王朝采取了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及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如继续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赋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制定了比隋律宽简的封建法律,重视地方官吏的人选,加强中央统治机构,设三省,六部,较有明确分工。这些法律、政府机构、编制,主要是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但它通过政权机构打击门阀士族,加强了中央集权,对于生产发展,也起了相应的进步作用。当时亚洲与中国相邻几个国家,有的也模仿唐朝的政治制度,对邻国的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

自唐王朝的建立,到安史之乱以前,约一百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人口有显著的增加,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人口达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为唐初的四倍。政治比较安定,物价低廉,“海内富有”,“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当时的唐朝是世界上极富庶、有高度文明的大国。

在这种富强的现象背后,已隐伏着社会的危机。上层统治集团开始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对人民的剥削越来越重,长安的繁华,上层的腐朽,引起了政治野心家的觊觎,安史之乱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安禄山和史思明对唐朝的叛乱,给唐朝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从此,唐王朝即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中央政府内部,皇帝不信任外官,形成宦官的专权;地方形成了军阀割据势力,长期与中央政府对抗。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才结束。

中唐以后，中央政府辖区缩小，收入减少，但是官吏、士兵、镇压人民的剥削者和寄生者却大量增加。在公元 875 年（乾符二年）终于爆发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和统治阶级战斗了将近十年，转战于南方与北方广大地区。起义军所至，直接打击了中央及地方地主官僚的势力。唐中央政府后来勉强延续维持了二十多年，于公元 907 年（昭宣帝天佑四年）灭亡。

唐末五代的封建割据，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早一时期的封建割据有所不同。唐末五代的封建割据，除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傀儡政权外，其余各地方政权，特别是江淮一带的小国家，发展了地方城市，形成了地方的文化、经济中心。

隋唐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并有长期的安定，与国际交流的频繁，因而提供了文化科学发达的条件。在科学方面，有印刷术的发明，晚唐以后，印书的风气流行，到五代时，雕板印书更为广泛。这一发明，不仅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世界的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天文学也由于农业生产需要，节气、朔望的推算，比过去更加精密。隋朝历学家有庾质、卢太翼和耿詢等，发明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能随着时刻的转动，浑天仪上的天象也有所转动。这是把时钟和天象仪组合在一起的一种精密仪器。隋朝科学家刘炫，修正了《周髀》关于每百里日影差一寸的说法，唐朝在此基础上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于公元 724 年（开元十二年）测定纬度，这是世界上最早实测子午线的开始。僧人一行与梁令瓚造浑天铜仪，以表示天体运行的速度，“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一行还观察星宿位置与古书记载有差异，这是“恒星自行”的现象在世界上最早的发现。

历法与算术有密切关系，唐初的李淳风、王孝通都是天文学家

和历法家。王孝通著有《緝古算經》，其中有关于三次方程式的解法。

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地理学也有很大的进步。关于国内的，唐代曾修訂十道图（国内地图），編著《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国外的，隋代有《西域图記》，記載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形式、民情風俗，有图象，有說明，唐高宗时，公元 658 年（显庆三年），有《西域图志》六十卷。德宗时，賈耽精研地理学，著有《隴右山南图》、《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七种，他继承了晋裴秀的地图繪制方法，以方格表示地图比例尺的画图方法（以一寸折成百里），并首創历史地理的研究法，“古郡国題以墨，今州县題以朱”（《旧唐书·賈耽傳》）。唐玄奘根据他在印度十几年的見聞、經歷，写成《大唐西域記》一书，成为后来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权威著作。

医学科学，也有很大的发展，建立了太医署，开始分科教学，并有制药科。著名的医师孙思邈著有《千金方》，王燾著有《外台秘要》，甄权著有《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图》。药物学方面有《新修本草》，收药八百四十四种，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頒布的药典。

这些科学成就，一方面是生产发展的結果，一方面又給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科学的根据。柳宗元、刘禹錫等人的《天說》、《天論》等唯物主义自然观，都可看到和当时天文学的关系。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階級斗争与思想斗争

隋朝統治階級吸取了南北朝門閥士族专政破坏中央集权的教訓，制定了打击門閥士族，向他們爭取劳动力的政策，唐朝統治者继承隋朝打击門閥士族的經驗，又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訓，制定了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因而形成了“貞观之治”和开元时期的經

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局面。唐代安史之乱以前，国力比较昌盛，人口有所增长，即说明农民在斗争中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某些让步后，生产力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当时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即使在安史乱前的“太平盛世”，已严重地暴露了贫富对立所隐伏的社会危机。

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已破坏，府兵制也不能维持，唐中央政府对地方失去控制能力，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强大。这些割据势力，多半是代表地方势力的军人，他们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极力搜刮民财，拥兵自重，又不断互相攻打，争夺地盘，使老百姓遭受极大的苦难。到了五代，有石敬瑭之流的“儿皇帝”，对外族甘心屈膝称臣称子，对内则作威作福压迫人民。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不断受到来自西方和北方民族的侵扰和国内地方割据势力的反抗。同时，农民的反抗和起义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皇帝不敢相信大臣和将帅对王朝的忠诚，于是把军政大权委托给皇帝最亲近的奴僕——宦官。这是一批不学无术、只知搜刮发财的豺狼，假借皇帝的名义，利用中央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强取豪夺，作恶多端，更激起城乡人民的忿恨。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五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黄巢领导的起义军打垮了唐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彻底扫清了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打破了作为佛教支柱的寺院经济，为后来两宋唯物主义学派的反佛教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阶级斗争相适应，在思想战线上也必然有所反映。唐王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了一些让步，但在思想领域内反而加强了。佛教、道教和儒家封建伦理规范成了隋唐官方对人民的三条思想绳索。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他们利用国家机构，大力推行符合他们需要的宗教